

概談日本教會的聖召

林康政

本文與大家一起反思日本人回應聖召的問題。雖然我沒有加入日本修會，但我曾旅居日本七年，期間辨別聖召、體驗隱修生活。我曾為日本修會團體協助靈修指導和課程，又在東京上智大學接受了兩年多的教義神學碩士培育。自 2012 年，我回應了聖召，加入了屬米蘭的基督君王俗世會，至今除流連在中港台教會服務外，也不時帶領日本人作聖言誦讀聚會，推動教理牧民。相信以上留日經驗，以及最近在東京四谷圖書館搜得的新知，有助本文從三方面——現代日本教會情況、殉道者的信仰與日本修道者見證，探討日本信徒的聖召。

1. 從教會現況看日本修道和司鐸聖召

以耶穌會和道明會為首的日本傳教工作，歷禁教和迫害達三個世紀，宗教自由終於 1889 年由「大日本帝國憲法」得以落實，先有巴黎外方傳教會擴展其傳教範圍，繼而有聖母幼子會、聖保祿孝女會及瑪利亞會等，於日本設置私立學校和醫院。由於傳教工作之興盛，教廷頒布傳教政策，把大多成立的教區託付給傳教修會管理¹，當中聖心會、瑪利亞傳教會，方濟會及聖靈會等，在日本教育工作尤為活躍，而聖母訪問會、長崎純心聖母會等外國

¹ 教廷於 1904 年委託道明會監管新成立的四國教區；於 1912 年聖言會受託管理新潟教區，1915 年方濟會受託管理札幌教區。長崎及東京教區於 1927 及 1937 年由外籍司鐸託管。廣島教區、仙台教區、大分教區、京都教區及浦和教區，分別於 1923 年、27 年、29 年、37 年及 39 年給耶穌會、道明會、慈幼會、瑪利諾會及方濟會託管。參閱網址「日本カトリック中央協議会」：<https://www.cbcej.catholic.jp/japan/history/>。

修會為日本傳教工作之貢獻，也有目共睹。隨著二次大戰爆發，已成立的六個教區²，連同十多個教會代牧區都一度受制。直至 1949 年 4 月 28 日，梵蒂岡返回與日正常外交，重新任命教廷特使，並於 1960 年出現首位日籍的東京教區土井總主教，於 1969 年長崎教區也有里脇總主教。³

日本天主教主教團，自 1952 年按照國家宗教法規定，法定名稱中譯名為「天主教中央協議會」⁴。主教團推選會長、副會長、主教聯繫和秘書各一位，成員為各教區主教、助理主教及輔理主教共二十四名，一年召開三次會議。日本天主教會共分十六個教區，包括札幌、仙台、新潟、埼玉、東京、橫濱、名古屋、京都、大阪、廣島、高松、福岡、長崎、大分、鹿兒島和那霸，當中東京、大阪和長崎定為總教區⁵。在各教區努力下，於 1987 年及 1993 年在京都及長崎舉辦了兩次全國性促進福傳會議（National Incentive Convention for Evangelization / NICE）。在長崎島本總主教召集下，第二次會議更選出全國三百名信徒，與司鐸主教們共議。⁶

2 戰前的六個正式教區，包括東京、橫濱、大阪、長崎、福岡、函館，見日本天主教會的教區發展圖，日本カトリック司教協議会イヤーブック（Catholic Bishops' Conference Of Japan Yearbook，2018），頁 209。

3 自 1919 年以來，羅馬教廷已派來駐日教宗使節，在 1942 年也駐有梵蒂岡日本領使，但戰前全是被委任的外籍教區教長，戰後才出本地教區主教。參閱網址 <https://www.cbcj.catholic.jp/japan/history/>。

4 主教團於宗教法的日語名稱「カトリック中央協議会」，見 Yearbook，頁 35。

5 見カトリック教会情報ハンドブック（Catholic Church Handbook，2018），頁 27-29、262。

6 兩次會議提出的福傳方向，尤其關注家庭與社會正義議題，參閱日本カトリック司牧司教委員会編，《福音宣教者の養成のために》（日本天主教會館，1994），頁 3-19。

如今，主教團每年都召開常規及非常規會議，討論世界主教團事務、普世福傳與牧民方向（如世界青年節），以及日本地方教會的政策和議題（如近年東北大震災前後的支援、幅射環保、頒布無核化指引，以及高山右近的列福事宜）。除了主教會議外，教區組織分成兩個由主教們組成的常務主教委員會及社會牧民委員會，專責轄下各委員會。前者負責禮儀委員會、教會行政法制委員會、終身執事培育委員會、學校教育委員會、福音新傳委員會、促進封聖委員會、財務委員會。後者轄下包括日本天主教正義與和平組織、日本明愛（Caritas Japan）、天主教部族歧視與人權委員會、難民及移居者委員會、維護兒童及女性權益等組織。另設相關委員會，如主教及修會會士共協委員會、聖經及教理部、宗教交談部、基督徒合一部、青年牧民部等，最後有執行教會內外事務局，專責報業出版，保持與社會各項溝通和合作之聯繫⁷。

按照 2017 年 11 月為止的統計⁸，全日本的天主教徒共有四十四萬一千一百零七名，七百七十九所天主教堂散布全國，聖職人員共一千三百九十二人，而獻身生活的男女⁹ 分別有一百七十九及五千一百九十三人，神學生共九十五名¹⁰。現時全日本人口約一億二千八百零六萬，天主教徒佔人口百分之 0.34，而主日彌撒出席約十萬多教友，於聖誕及復活節增至二十三萬九千及十八萬二千多教友出席。日本全國都設有天主教的醫療所，包括病院、診所及老人院等共四十二所。社會服務機構如託兒所、老人服務中心

7 參閱 *Yearbook*，頁 37-61。另見 *Handbook*，頁 262-263。

8 這段的統計數字全部直至 2017 年 11 月為止，參閱 *Yearbook*，頁 210-237。

9 日籍及外籍修士分別有一百二十九位及五十位，日籍及外籍修女分別是四千八百二十三位及三百五十四位，另有女俗世會成員二百一十人，見 *Yearbook*，頁 198。

10 見 *Handbook*，頁 2-3。

等共六百四十一所。教育機關即幼稚園、中小學、高等學校、短期大學、專上學院、大學，連同特殊學校共八百四十一所。至於避靜院共有三十七所、四所小型神學培育場所全集中於長崎，而學生有十五名。全國四所神哲學院的學生共五十三名。屬各教區有日籍司鐸四百四十二名和外籍司鐸五十三名。至於在日的男女修會，分別有四十五和一百個¹¹，修會日籍司鐸三百八十名及外籍司鐸四百五十一名。就入教情況，去年全國的嬰孩洗禮共有二千六百名，而成人受洗的男女分別是一千一百七十二及一千七百三十五名。

從上述主教團工作、教會組織功能及修會服務項目去理解，教會對外的社會參與十分強勁，尤其與各宗教交談與合作、基督徒合一活動、對社會正義與和平推動等¹²。此等福音初傳的工作和見證，為每年新教友增長帶來正面影響。不過，對日本人回應修道聖召卻不足夠。教會福傳只以人格成全為目標，只著重社會服務，而深化教友的信仰皈依和禮儀參與之牧民活動不足，難以划到深處，以孕育修道獻身和司鐸聖召。長崎教區的高見三明總主教在慶祝《天主教教理》頒布廿五周年紀念之際，就針對這問題，提出信徒的信仰要紮根於聖言，在禮儀中表達，在生活中實踐，才能達致與主交心之靈修成熟。然而，普世教會的成人入教培育過程，如何在日本各堂區中結合禮儀舉行和牧民工作，卻有

11 日本男女修會數目統計，來自大山悟等編著「附錄索引」，《神父と修道士と宣教師たち》及林義子編著，《シスターた》（東京女子パウロ会，2015），當中顯示本地隱修或半隱修修院數目和人數佔多，尤其是熙篤會於日本全國有女修院五間，男修院二間，這或許與日本人偏愛靜觀默想和團體服務有關。

12 這也可見於日本主教團的文獻，多就宗教交談、宗教合一、社會和家庭倫理、環保及無核化議題等，給予不少指引和訓示，詳見日本主教團網站「出版案內」<https://www.cbccj.catholic.jp/publish/>。

待改善，仍有相當挑戰¹³。這些問題同樣可套用於日本的修道聖召情況，也是現今日本的聖職人員培育之限制所在。

2. 殉道者信仰對日本人聖召的激勵

追索日本教會的歷史¹⁴，始自 1549 年 8 月 15 日耶穌會士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 1506-1552）在九州鹿兒島首度登陸。除了耶穌會的傳教工作，繼而有方濟會、道明會及奧思定修會成員從印度、菲律賓等地來日，由福音宣講到興建教堂、修道院、學校和醫院等，以見證信仰，影響民生和社會。回看 1614 年的統計數據，教會信徒人數顯著上升，達一百五十位神父和六十五萬多信徒，涉及全國五十五家戶及當領主的大名皈依。織田信長（1573-1582）掌權期間，對天主教會的傳教政策仍算友善，然而豐臣秀吉（1582-1598）認為天主教徒對日本人文化思想影響之甚，在 1587 年頒布「伴天連追放令」¹⁵，更嚴懲是 1597 年於長崎進行十字架刑罰，導致修會人士和司鐸共二十六名日本長崎殉道者，遭迫害至死。進入江戶時代，即德川幕府期間，熱心的佛教徒德川家康（1603-1616）對外國勢力深感疑慮，於 1614 年針對信徒頒發「全國迫害令」，於二代將軍——德川秀忠（1616-1623）及三代將軍——德川家光（1623-1651）全面實施，歷二

13 有關高見總主教就第 14 屆世界主教會議提案「教會生活與宣教」之日本人培育困難，及教友入門培育挑戰，見 <https://www.cbcj.catholic.jp/wp-content/uploads/2018/01/synod14.pdf>，2018。另見日本橫濱教區典禮委員會編，《成人のキリスト教入信式》儀式書解說（東京女子パウロ会，2010），頁 88-105。

14 就日本歷史發展框架及禁教迫害，參考日本天主教團網站：<https://www.cbcj.catholic.jp/japan/history/>。

15 「伴天連」一詞，取自「Padre」葡萄牙文的日本漢字拼音，用於驅逐神父（Padre）傳教士於國外之命令，見 H.チースリク監修、太田淑子編，《日本史小百科：キリストン》（東京堂出版，1999），頁 189-192。

十年之久。這不單由禁止外籍傳教士進日以至判刑處死，更開始迫害日籍神職人員與平信徒，致使成千上萬的日本人喪生，其中以元和 8 年（1622 年）「元和大殉道」最為嚴重，此乃長崎一帶第二次遭受大迫害。當時興起以「踏繪」方式迫使日本信徒背教。那些不肯就範的信徒就要慘遭種種迫害酷刑，例如十字架刑、斬首刑、微火烤刑，灌涼水刑、鐵針或竹串插入指甲或陰部刑罰，更恐怖有「倒吊洞穴的刑罰」¹⁶。翌年 1633 年，全國更頒布第一次鎖國令，實施貿易海禁。為保存信仰於家族後代，長崎境內出現「隱蔽教友」生活¹⁷。直至 1865 年後，長崎建立大浦天主堂及首個代牧區¹⁸，這些「隱蔽教友」後人才公開身份和信仰。

日本教會的殉道歷史由始至今對日本人堅守和延續天主教信仰影響之深，殉道者的典範常用作信仰見證和聖召呼籲，而日本教會在每次列福封聖時，都重申若望保祿二世曾到長崎殉教地所引用三世紀載都良教父（Tertullian）《護教書》50,12 的話：「殉道者的血是信友的種子」。日本自開教至今，一共有五次封聖或列福典禮。最先兩次都是由教廷於 1862 年和 1867 年發起，經教宗庇護九世頒布。前者針對 1597 年豐臣禁教令下西板長崎的二十六位殉道聖人，即保祿·三木及其二十五名同伴。後者把 1617 至 1632 期間德川教難下的二百零五位殉道者列為真福。前後兩次都以 1624 年前的殉道者居多，並以外籍司祭及男性為主。第三次由

16 有關踏繪、刑罰及鎖國令等，見同上，頁 209-211、217-221。此等九洲殉教者所受的迫害，也可從日本天主教文學家遠藤周作（1923-1996 年）所編著的《沉默》一書得以引證。

17 有關「隱蔽信徒」或日語的「潜伏キリスタン」的開展，見同上，頁 230-231。

18 日本首個代牧區於 1846 年在香港設立，因為 19 世紀中葉的日本被西方列強迫使重開長崎港，教廷本應委任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的福爾卡德（Folkard）為日本長崎首位代牧長，但因其鎖國政策未全解禁而無法進日，唯留港暫待。直至 1857 年幕府全面解封，橫濱和長崎於 1863 年及 1866 年分別成立代牧區，看 *Yearbook* 發展圖，頁 209。

道明會士發起，於 1987 年經由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封聖，主要是 1633、1634 及 1637 年於長崎殉道的聖西多默及十五位同伴，均屬道明會會士，司祭或第三會成員¹⁹。唯有第四次列福典禮由全日本各教區作主動申請，來自 1624 後分布於日本全國十二區，包括東京、新潟、京都、大阪、廣島、福岡、大分、鹿兒島，以及長崎佔有四區的殉道者。此乃 2008 年 11 月 24 日的一百八十八名殉道列福典禮，以耶穌會士伯多祿·岐部神父為首，當中除了四位聖職人員及一位修士外，其餘是一百一十六名男性及六十七名女性的教友，包括教會團體領袖、傳道員、家庭成員、武士、農民、傭人、婦孺及老弱幼少。我有幸當年於長崎能出席該慶典，感受到日本教徒視殉道者的英勇作證為信仰之模範、修道聖召之動力，以敲醒每位日本信友的心靈。如同列福典禮的口號：「跨越時空，在今天迴響著真福者的祈願，為主捨命而活出生命」²⁰。日本教會於 2009 年司鐸年，也標榜這四位真福司鐸，藉此強化日本信徒的司鐸聖召²¹。去年 2017 年 2 月 7 日就有第五次列福典禮，得到教宗方濟各許可，就是大板高槻城主高山右近。他不單是一位善戰武士，也是信德鬥士，曾在 1587 年豐臣禁教期被勸背教，但他堅守信仰，為此經歷了 1612 年德川幕府的教難，最後死於異鄉菲律賓。由於他的武士道精神，連結茶書琴詩的日本文化與信

19 有關首三次日本列品紀錄，見カトリック中央協議會，「前言」，《聖トマス西と 15 殉教者》（日本主教團，1988）。在 1862 及 1987 年兩次封聖中，更有兩位華籍血統教友——鄭安道與李樂倫同列為聖人。

20 就日本一百八十八位殉道真福慶典及本人對日本人信仰之反思，見林康政，「伯多祿·岐部及一百八十七位日本殉道者的列福典禮」，香港《公教報》，2009 年 2 月。

21 參閱溝部脩，《キリスタン時代の司祭像に学ぶ》（日本主教團，2009），頁 5、7-18。

仰，日本教會以他的靈修和德表，鼓勵信徒反思如何使信仰深化，讓聖召開花結果，以孕育日本人的信仰與聖召體驗。²²

3. 日本修道人對聖召認知與經驗

談日本的信仰本地化，必要提及由首位日本傳教士方濟各·沙勿略的傳教方法，直至范禮安按佛教思想編成《長崎教理》²³，所面對的地方文化挑戰。這問題再加上日本語對基督信仰表達之限度，對日本人的信仰與聖召認知有重大影響。此外，現今日本教會要適應社會需要，並與不同宗教融和等，都在塑造司鐸及修道人於召叫和職務之經驗。這些元素會在這部份逐一交待。

方濟各·沙勿略在馬六甲傳教時，因認識了一位日本人安次郎而給他施洗，自此他就決定偕同兩位耶穌會士從果阿出發，展開他的日本傳教生涯，堪稱為日本教會的開教功臣和主保聖人。自 1551 年，他經由九州鹿兒島、平戶、博多和大分一帶，北上到山口，直達京都，以兩年多時間，在日本各地皈依了約二千人，入教人數其後不斷上升²⁴。不過，他在過往各傳教區應用的傳統教理元素²⁵如信經、十誡、祈禱經文等，配合當地語言歌曲之教授法，卻無法套用於有根深蒂固文化和風俗，並深受崇拜自然與多

22 參閱列聖列福特別委員會編，《現代にひびく右近の靈性》（日本主教團，2012），頁 12-13。高山右近的靈修與信仰本地化對日本教會發展之重要性，得由教廷封聖部部長亞馬多（Amato）樞機以教宗代表身份兩度認定，此乃出自亞馬多樞機在 2017 年 2 月主持其列福禮及感恩彌撒的講道。見 *Yearbook*，頁 17-32。

23 參閱林康政，《教理講授十講》（香港天主教教區教理中心，2013 修訂版），頁 113。

24 聖方濟·沙勿略的日本足跡與影響，參閱高木一雄，《關西のキリスタン殉教地をゆく》（長崎聖母騎士會，2005），頁 7-24 頁。

25 傳統教理的元素指奧思定《信、望、愛》的教理集成，以及多瑪斯的教理四大支柱，此乃後來《羅馬教理書》取以的綱領，也是所有傳教區推動教理與信仰本地化之必要參照。參考《教理講授十講》，頁 108-111。

神的神道教，以及佛教思想哲理所薰陶之日本。為此，聖方濟·沙勿略的培育只能集中在信經講解，再且其日語能力欠佳，只能找同伴即時傳譯，又借助兒童祈禱和記憶，向成人傳佈福音等，以團體的教理傳授方式作信仰本地化²⁶。

另一位耶穌會士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 1539-1606）分別於 1579-1582、1590-1592、1598-1603 年曾三度留在日本傳教。他的傳教方針取以「適應政策」，以順應日本文化理解和實踐（accommodation），與教會的本地化（inculturation）意義有別²⁷。雖然如此，范禮安仍堅守基督宗教信仰，他安排了四名「天正使節少年」的派遣，組團到歐洲教會體驗信仰，並配合培育工作，以推動建設大小修院及基督教版本印刷等²⁸。此外，他更努力把一本遵照《羅馬教理》編輯而成的 1566 年《基督徒教義》翻譯成日語，並設法以天主存在、教義及十誡等教理，幫助日本人脫離多神宗教觀，達致在基督內皈依²⁹。然而，為求皈依他們，他最終只能屈服於日本諸派宗教哲學思維和儒佛觀念，為日本人傳授信仰，編成《長崎教理》，可是當中提及「神」、「魂」的信仰觀已經與日本佛教與神道觀混淆，容易誤導信仰³⁰。日本人對信仰

26 聖方濟·沙勿略借助兒童學道，以本土語文向成人複述教理，讓聽道的成人於課堂外記下道理，再而向外教徒作信仰見證。參閱本人於香港教區教理中心的文章「介紹聖方濟·沙勿略的傳教使命及對教理講授的影響」。網址 <http://dcc.catholic.org.hk/dcc/wp-content/uploads/fillup/Adult/AD/AD011.pdf>

27 見川村信三，《時のしるしを読み解いて：歴史にみる現代キリスト者の課題》（DON BOSCO, 2006），頁 208-209。

28 四名年約 13-14 歲的青年使節，在范禮安的提案下得於 1582 年（天正 10 年）年派往葡國及羅馬，會見國王和教宗，學習福音宣講，隨團也有八位技術專才及司鐸修士。他們直至 1590 年返日，接受鐸職和協助傳教。見《日本史小百科：キリスタン》，頁 80-82。

29 Paul Turner, "Alessandro Valignano", *The Hallelujah Highway, A History of the Catechumenate*, (Chicago: Liturgy Training Publications, 2000), pp.124-129.

30 見尾元悟編，《ヴァリニャーノのカテキズモ》，《イエズス会コレジオ講義要綱》II 解説（教文館，1998），頁 439-443。另見海老沢有道、井手勝美、岸野久編著，

中的「靈魂」之漢語概念和用語表達常連繫到「幽靈」、「惡靈」之意義，這一直影響到今天日語彌撒經文之譯文，沒法獲教廷批准³¹。信仰內容若受制於語言文化而無法演繹，確實障礙信徒認識整全信仰，更談不上甚麼聖召。

日本人對信仰認知不單一直受制於混雜的宗教與文化元素，以日語去表達信仰也未有一致共識，信仰偏差當然直接影響聖召質素。比方談及聖召的日語漢字是「召命」，此字有「人的職務和使命」之民間意義，也有「成聖成全」的信仰幅度，更可直接指「司鐸職務及修道獻身」³²。江戶時期主要以漢語詞彙表達天主教教義³³，而信仰古書常發現應用漢字和外來語拼音之間的張力，例如「基督徒」（**Christian**）一詞可同時用漢字讀音「切支丹」和片假名的外語拼音「キリシタン」來翻譯。即使是「本地化」一語，也有兩個譯文，一是用漢字「文化內開花」來表達，另一是用外來語譯音「インカルチュレーション（**Inculturation**）」³⁴。就這問題，去年剛退任的東京岡田總主教卻指出：「宜使用另一漢語譯文——文化福音化，以強調福音意義重於文化限制」³⁴。如果現今教會當局或學者³⁵只以為用片假名來直譯外來語詞彙，就

〈解題——日本ノカテキズモ〉《キリシタン教理書》（教文館，1993），頁 504-506。

31 此乃 2002 年新編《彌撒經書總論》有關「神」、「魂」的日語翻譯，以及瑪 8:8 節應用之困難「我的靈魂就會痊癒」。參見具正謨，〈新ミサ典礼書の日本語翻訳について〉，《神学ダイジェスト》（上智，2009），頁 115-116。

32 見上智學院大事典編纂委員會編，「召命」，《新カトリック大事典》III（研究社，2002），頁 289-290。

33 參閱古偉瀛，〈中、日、韓三國對天主教的最初反應之比較〉，《台大東亞文化研究》期刊，2013 年 9 月 26 日。

34 引自岡田武夫，《宴への招き——福音宣教と日本文化》（あかし書房，1983），頁 112，詳見頁 119-144。

35 日本教會當局已設有特別委員會，專責研究並關注日本語就漢字及外來語譯文之間問題，見 *Yearbook*，頁 53。

能解決問題並能傳達信仰，這對日本人認識信仰真諦及回應聖召，根本毫無意義和益處。

至於日本人如何理解修道獻身和司鐸聖召，宜引證於日本教會的兩份官方文件——中譯文為《日本天主教神學院的培育理念與指南》³⁶及《今日眾所要求的司鐸角色》³⁷。前者是2009年為迎接司鐸年所頒布的，說明教會與日本社會所要求的司祭培育與職務，後者輯錄了各修會神父及修道人心聲。現從教會職務、司鐸培育、聖召意義和修道經驗四方面綜合一談。

- (1) 在教會職務方面，該指南偏向以社會見證職務作為日本所要求的司鐸像，關注尊重生命人權、家庭福祉、戰爭與和平、科技發展等議題，並注意日本教會在亞洲地區裡信仰本地化之特色，促進與各宗教與文化對話，持守團體共融，以擔負福音新傳的使命。至於司鐸的宣講和禮儀兩職務，本文第一部份已指出日本教會之不足。這也是一位學者古巢馨神父於列福講座中指出，相對於殉道者時代的教會三職，今天日本教會卻面臨培育不足、禮儀分化之局面。³⁸

36 日本主教團的〈日本カトリック神學院の養成理念と指針〉（中譯）載於2009年《キリストン時代の司祭像に学ぶ》附錄裡，其引用教會文獻包括梵二大公會議《司鐸生活與職務法令》（1965）；宗座教育部文件《有關司鐸培育的基本綱領》（1970）、《修院的禮儀訓令》（1979）及《有關社會傳媒的神學培育指南》（1986）；《我要給你們牧者》宗座勸諭（1992）及美國 National Conference of Catholic Bishops, *Norms for Priestly Formation*, 2 Vols, (1993)，以重申普世教會對司祭的要求，包括天主召叫、宗徒對基督的服從、作為公務司祭團體一員所擔負的三重職務，與天主子民普通司祭職合作。在這原則下，文件詳談日本司鐸配合社會需要的職務。

37 文件內容用於這裡的第（3）及第（4）點，作為司鐸及修道人的聖召觀點和經驗分享，見日本カトリック管區長協議會編，《今求められる司祭像》（日本天主教會館，2010），頁13-14、25、29-38、46、49-51、53-57。

38 古神父作為列福委員會成員，指出過去日本有眾多英勇德行之殉道者，乃出於強盛的教友組織，即專責宣講、禮儀和社會服務之聖母組、聖體組和慈悲組。信徒的穩健信仰來自當時日本教會的三重職務所孕育，有別於今天日本教會缺乏正統培育及禮儀多

- (2) 在司鐸培育方面，指南已提出兩年哲學及四年神學培育要達致人格、靈性、知性和牧民四層次，與普世教會要求相約。然而，綜觀現時培育司鐸和修會人士的四間日本學府——耶穌會的上智大學、聖言會的南山大學、教區於東京及福岡兩地的神學院，似乎未能達標，包括第四年執事年培育沒有出現於正規課程中；傳教及禮儀實習也要視乎各教區及修會安排；科目缺乏教會靈修和牧民幅度；教區司鐸延續培育及支援機制不足等。比方，南山大學的基礎神哲學培育，附屬校內人文學科，偏重人格、文化與社會幅度³⁹，而上智大學雖然有獨立神學系，但卻加入不少非主流學科，如和平論、基督宗教文學與藝術、天主教與基督教、天主教社會思想等⁴⁰。只有屬日本教區於東京及福岡神學院的課程卻較為完整⁴¹。從聖召和職務培育去評估其學科，宗教與神哲學知識、教會信仰生活、禮儀祈禱與牧民實踐之間未能整合，而靈性培育與社會參與之分割都難以陶成修道人及司祭的身份、使命和靈修。
- (3) 在聖召意義方面：2009 年司鐸年所強調的是司鐸職務與靈修不可分，由此引申司鐸被召身份（**Being**）、與主關係（**Relating**）及服務使命（**Doing**）之三重整全幅度⁴²。綜合日本司鐸的聖召經驗分享，在日服務的外籍傳教司鐸會贊同

元混雜。詳見本人《公教報》刊文，〈伯多祿·岐部及 187 位日本殉道者的列福典禮〉。

39 南山的神哲學課程被置於「人文學部」其一學系，稱為「基督宗教學科」，與人類文化、人性心理及日本文化三學系並列。參閱南山大學課程手冊 2018 年度，頁 31-44。

40 上智大學是唯一的日本教會大學，可給學生頒授教會學位（S.T.B.），但因學士學位未能滿全教會學科要求，只能從碩士課程（S.T.L.）的神學科目來補足。有關其科目和體系，參閱上智大學課程手冊 2018 年度，頁 42-46。

41 教區神學院於福岡和東京院校的課程，詳見其「講義要綱」2017 年度。

42 見林康政，〈從司鐸年到教友年〉，香港《公教報》，2010 年 6 月 27 日。

本篤十六世以聖維雅納神父的芳表，重申司鐸身份和職務之緊密關係為日本聖召所必須。聖言會的市瀨神父強調日本人團體之和諧共融，對司鐸於福音體驗中成長成全之重要性。方濟會小西神父就重視在團體生活中強化與主親密關係，善用主賜恩物去克服司鐸在聖事和社會中機械性的服務。

- (4) 在修道經驗方面：在上智大學舉行的獻身生活者聚會當中，耶穌會的岩島和瀨本兩位神父均道出在校園任教之危機。前者說人家只認定自己為教授，卻忘了自己神父的身份和職務，而後者就說司鐸聖召因工作忙碌容易迷失而死掉。至於在校就讀的男女會士，他們都認同修道人回應聖召的該有方式，要先把信仰紮根於教會訓導，於聖事和祈禱生活中獲滋養後，才能做好教會服務、愛德事工和社會關懷。

4. 總結

日本教會要強化聖召，相信過往殉道者的靈修經驗和培育方向，有助今天日本教會面對文化、語言，甚至是社會俗化帶來的信仰挑戰，並要在教會牧民層面上平衡發展宣講、禮儀和社會見證三重職務。這裡，我引用萬民福音傳信部部長費爾南·斐洛尼樞機主教（**Fernando Filoni**）於2017年9月去訪日本十天後感，作為本文的總結。斐樞機指出：「日本天主教徒在主愛祝福的五百年內，無論是宗教迫害與教難或是隱蔽教徒之復興，信仰傳遞有賴多年來各傳教修會的努力，一直生生不息，功不可沒……在這個非基督徒的俗化科技社會裡，並受儒家、神道及佛教思想薰陶下，至今仍能邁向五十萬天主教徒，實在難能寶貴……在信仰本地化的挑戰下，教會要面臨司鐸聖召短缺問題，而聖職人員、獻

身生活者及教友必須完全依靠上主恩寵……期待未來在這日昇之地，基督信仰種子得以散播，盛結果實。」⁴³

⁴³ 見 “The future of the mission is the gospel from Japanese to Japanese”, *Inside Vatican Magazine*, ed. Robert Moynihan, (United States, Urbi et Orbi Communications), November, 2017.